

最后的天空之后

AFTER THE LAST SKY
PALESTINIAN LIVES

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EDWARD W. SAID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 著 / 金明珉 译

[瑞士] 吉恩·莫尔 / 摄影

这是萨义德
担当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
而完成的一部杰作……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最后的天空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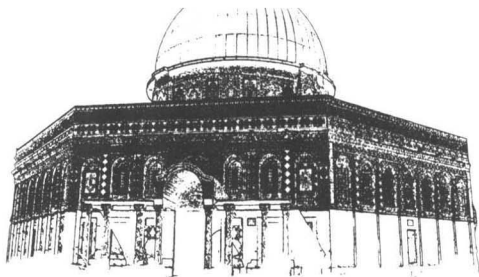
AFTER THE LAST SKY
PALESTINIAN LIVES

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EDWARD W. SAID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 著 / 金玥珏 译

[瑞士] 吉恩·莫尔 / 摄影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天空之后 / (美) 萨义德著; 金玥珏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10

ISBN 7-80225-128-1

I. 最... II. ①萨... ②金... III. 巴勒斯坦—概况—摄影集 IV. K93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8574 号

最后的天空之后

(美) 萨义德 / 著 金玥珏 / 译

责任编辑: 刘 刚

装帧设计: 林 涛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787 × 1 092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12 千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一版 200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 001~6 000

定 价: 25.8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致 谢

ACKNOWLEDGMENTS

本书的写作得益于很多人珍贵的帮助、鼓励和关怀。伦敦费伯—费伯出版公司的唐纳德·米切尔、纽约潘赛恩图书出版公司的安德烈·希夫林一早就向我们表示了他们的声援和支持。之后，萨拉·伯什特尔辛苦而又敏锐的编辑使这份书稿更加优美和尖锐。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助理，德博拉·普尔精确到位地校对书稿，尤其是协调文字与图片之间的关系。多方面亲密的朋友——戴尔德丽·伯格森和艾伦·伯格森，朱莉·戴蒙德和伊科博尔·阿马德，珍妮特·阿布—卢格德和伊卜拉欣·阿布—卢格德，理查德·波里尔——都向我提供了消息灵通和精确的读物。我还要向以下这些人致谢，卡马尔·布莱塔，伊卜拉欣·戴卡克，坦尼亚·纳西尔和汉纳·纳西尔，米林·戈森，弗兰·安特曼，诺巴·霍夫塞皮安，伊利·桑巴，谢菲克·阿尔—霍特，以及马哈穆德·达威什^[1]（他的诗歌勾勒出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每个画面，因此我借用他诗歌中的一句话作为本书的书名）。他们给我的建议和帮忙实在太多，在此难以一一列举。最后，玛丽亚姆·萨义德^[2]用特有的智慧和爱的支持始终守护着我们的努力。

爱德华·W. 萨义德

纽约，1986年

^[1] Mahmoud Darwish (1942—)，马哈穆德·达威什，巴勒斯坦著名诗人，出生于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山区的一个村庄。1948年，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以后，Darwish一家离开家乡成为难民。1970年，Mahmoud Darwish前往莫斯科的一所大学深造。之后他曾先后在埃及、黎巴嫩、突尼斯和法国定居。1984年出任巴勒斯坦作家和记者协会主席，1987年当选巴解组织执委会委员，兼任文化和新闻高级委员会主席。Mahmoud Darwish的诗歌主要反映巴勒斯坦人丧失故土流离失所的悲哀和痛苦，以及对明天的美好希望，代表作有《巴勒斯坦，我的国家》、《玫瑰更加稀有》、《在这土地上的最后夜晚》、《橄榄枝》、《巴勒斯坦有情人》等，至今已出版了30多本诗集，作品被翻译成35种语言。本书的注释全部为译注，以下不再一一说明。——译者

^[2] Mariam Said，玛丽亚姆·萨义德，萨义德的妻子，出生并成长于黎巴嫩。

在最后的国境之后，
我们应当去往哪里？
在最后的天空之后，
鸟儿应当飞向何方？

——马哈穆德·达威什

前言：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PALESTINIAN LIVES

写作这本书的念头最早来自吉恩·莫尔和我的首次见面。1983年，我担任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ICQP）^[1]的顾问，我提出建议在日内瓦主会场的入口大厅里悬挂有关巴勒斯坦人的照片。当然，那时我已经知道并且十分仰慕莫尔为约翰·伯杰^[2]拍摄的照片，因此我推荐联合国委派他去拍摄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几个主要场所。这个提议最初受到了热情的回应，于是莫尔便在联合国的特别资助下前往近东^[3]。他带回来的照片确实非常精彩，但是官方的反应却莫名其妙，或者对某些喜欢讽刺的人来说是微妙的。我们被告知可以悬挂照片，但是不能配以任何文字。既不能有文字说明，也不能有图片解释。最后的折衷办法是那些放大的图片可以附上国名或地名（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但除此以外禁止任何其他文字。吉恩和我就是在面临这样一个奇怪而又顽固的规则时相遇的。

如同所有的官僚机构一样，有关禁止文字之事我们也只得到了官僚的解释，而我必须说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其中的任何一条。不过，我非常确定地记得反对的理由被归于“一些联合国成员国”，这些国家在ICQP会议的准备期间，感觉任何有关巴勒斯坦人的不变的文字都是令人讨厌和在原则上难以接受的。哎，这些成员国主要都是阿拉伯国家，他们甚至对于召开ICQP会议这样的想法都存在各种意见，这一切都留下了令人遗憾和可耻的记录。巴勒斯坦对于他们而言只有一项用途，那就是攻打以色列、抗议犹太复国主义^[4]、帝国主义和美国，以及叹息被占领土上兴建定居点和阿拉伯土地被没收征用

^[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简称ICQP，于1983年8月29日至9月7日在日内瓦召开，共137个国家参加。会议的召开最初遭到以色列和美国等国的反对。

^[2] John Berger（1926— ），约翰·伯杰，小说家、画家、艺术评论家、艺术史家，出生于英国伦敦，作品包括《一个幸运的人》、《另一种叙述方式》等。

^[3] Near East，近东，指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与中东通用。

^[4] Zionism，犹太复国主义，又称锡安主义，指犹太人以回归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为目标的全球性政治运动。Zionism一词来源于Zion，汉语常译为“锡安”，是古代耶路撒冷的一座山丘，在《圣经》中锡安被认为是上帝居住的圣地和封大卫为王的圣山，因而成为犹太教徒心目中的圣地，具有强烈的宗教和感情色彩。作为一个现代政治术语，Zionism一词在1892年1月被Nathan Birnbaum首先提出。1897年在瑞士巴塞尔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被正式采用。

的理由。除了这项用途以外，当涉及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的紧急需要，或者是许多巴勒斯坦人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所处的极其糟糕的境况，则必须划清彼此的界限。在会议开始前的一年中，我曾受联合国大会命令委派了至少20项研究，这些研究的原意是向ICQP会议的参加者——清一色为政府——提供关于我们民族的必要信息。但是，只有其中三份报告幸存下来，成为会议的官方文件。其他的则全都被删去或否决，原因是一个接一个阿拉伯国家反对这条或那条原则，此处或那处暗讽，这个或那个假定的对他们主权的伤害。而以色列和美国则不愿意屈尊去理会有关该会议的任何方面。

吉恩·莫尔和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决定一起工作。我们对彼此说，让我们来使用这些照片和文字说明，讲述巴勒斯坦人从未被人提及过的故事。然而，如何用一种新鲜的方法来描写和表现——从字面的任何意义上来说——巴勒斯坦人，却成为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因为并非没有人谈论或描写过巴勒斯坦人，困难在于所有人，包括巴勒斯坦人自己在内，都谈论过很多。大量的文学已经形成，其中大部分是争辩、控诉和恐吓。在目前这个时刻，没有人从零开始描写巴勒斯坦，事实上没有人还前往巴勒斯坦。我们过去都曾经去过那里，或者通过阅读有关巴勒斯坦的文字，体验它千年的历史和力量，或者确实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那是一个极度拥挤的地方，对于历史或历史解释对它的诉求而言，几乎太过拥挤。

然而，即使有所有这一切关于巴勒斯坦人的描写，依然无人真正了解他们。尤其是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与其说巴勒斯坦是个民族，还不如说是号召武装的借口。我们这个民族肯定还不如和我们同样声称拥有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来得有名。自从1948年以来，我们就一直是一个次要的存在。我们大量的经历都没有被记录下来。我们中的很多人被杀害，很多人留下永远的伤痕，并且从此沉默，毫无踪迹。而那些被用来表现我们的形象只是更进一步地削弱了我们的真实。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巴勒斯坦人主要被看作是战士、恐怖分子和不法的贱民。如果说到“恐怖”这个词，一个人头戴阿拉伯头巾和面罩、扛着卡拉斯尼柯夫步枪^[1]的形象立即跃于眼前。有些时候，悲惨无助的难民形象也会取代这个危险的恐怖分子成为“巴勒斯坦人”的真正图标。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境遇的巨大变化继续让我们的真实状况复杂化，这种变化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在某个季节，我们中的一些人在萨布拉-夏蒂

[1] Kalachnikov (1919—)，卡拉斯尼柯夫，俄国著名枪械发明家，发明了AK-47 (Avtomat Kalashnikov-47) 步枪等。俄文全名常写为М.Т.Калашников，英文常写为М.Т.Kalashnikov，或Mikhail Kalashnikov。国内译名除“卡拉斯尼柯夫”外，也很流行“卡拉什尼科夫”。

拉难民营^[1]被以色列指使下的黎巴嫩马龙派民兵^[2]集体屠杀(分清这场屠杀是由黎巴嫩马龙派还是以色列指使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才能搞清楚谁应当为此负责);而在另一个季节,就在这场大屠杀成为以色列残暴行径的可怕记号后不久,什叶派阿迈勒^[3]民兵,多半是在叙利亚的指使下,围攻了同样的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4],并且犯下了许多同样的暴行。

今天,每当巴勒斯坦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总是在讨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主题:阿拉伯朋友和以色列敌人是如何对待我们的。有的时候,很难说是谁在哪里对我们更糟糕。虽然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清楚地知道,我们在最近30年中的遭遇是由1948年以色列破坏我们社会所直接造成的,但问题是——政治上的和我们认知上的——在我们1948年的灾难和今天的不幸之间,是否能够划上直接的联系。

我不认为可以划出这样的联系;一个清楚和简单的叙述能够说明我们复杂的经历。即便以色列的确在阿拉伯国家内外对我们无情地紧追不舍,自1948年以来一刻不停地打击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甚至是巴勒斯坦这样的观念,我们在阿拉伯国家中的遭遇毕竟是阿拉伯人自己的经历,这些遭遇都是独立的。不论我们身处何方,都无法甩开我们的过去,但是我们却创造了新的现实和关系,它们既无法进行简单的归类也有异于我们过去所碰到的情况。

复杂性还不止这些。我们无人能忘记暴力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1948年我们被斩尽杀绝的暴力和社会被毁,或者是敌人对我们所施加的暴力,我们施加在别人身上的暴力,还是最为可怕的,我们在彼此身上所发泄的暴力——巴勒斯坦人的这些经历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也强化了我们作为远离他人群体的自我意识。虽然我们中很多人会立即回应说,我们所遭受的暴力多过我们在别人身上所施加的,我们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为了自我防卫,而且在阿拉伯、以色列和美国政府之间更有不公开的默契要消除我们这支政治力量,我们中的很多人也会承认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动态,

[1] Sabra and Shatila, 萨布拉-夏蒂拉, 位于黎巴嫩贝鲁特市南郊的巴勒斯坦难民营。1982年9月, 在以色列军队的支持下, 黎巴嫩的马龙派长枪党民兵对萨布拉-夏蒂拉的千余名巴勒斯坦难民进行了血腥屠杀。

[2] Maronite, 马龙派, 属于东仪天主教会, 是黎巴嫩最重要的宗教教派之一, 左右黎巴嫩的政治局势。据说为叙利亚人马龙(?—410)所创, 保持古代叙利亚教会的传统礼仪, 使用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

[3] Amal Shi'ite, 什叶派阿迈勒。Shi'ite, 什叶派, 伊斯兰教教派。阿拉伯语什叶意为党人、派别, 专指阿里的追随者, 该派以拥戴阿里及其后裔为穆斯林社团领袖为其主要特征, 因内部分歧后分化出许多支派。全世界什叶派穆斯林约有8000多万人, 主要分布在伊朗、伊拉克、也门、黎巴嫩、巴基斯坦、叙利亚、海湾各国和东非等地区。Amal, 阿迈勒运动, 1974年成立, 为伊斯兰教什叶派主要组织。Amal在阿拉伯语中是“希望”的意思, 阿迈勒运动在黎巴嫩内战中逐渐强大起来, 并发起了“打击巴勒斯坦难民营”的运动, 最强盛时曾经拥有14000名民兵, 现已部分解散, 余部主要集中在黎巴嫩南部。

[4] 1987年2月, 什叶派阿迈勒民兵在叙利亚支持下包围萨布拉-夏蒂拉等多处巴勒斯坦难民营, 用重炮、坦克轰击难民营, 造成数万人伤亡。

尤其是在1967年^[1]以后，已经形成一种特殊的逻辑，这种逻辑不容许有如此简单和简化的辩解。是的，我们是受害者，我们的民族身份受到威胁，但是，不，我们也不是被动或无辜的。换句话说，我们所激起的激情，已经证实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股相当独立的力量，否认它的存在是不诚实的。

自然，我们不能说每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感受都和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的完全一样：我们的命运太过多样和分散，因而无法达成这样的一致。但是毫无疑问地，事实上我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虽然本质上是一个建立在受苦和离散上的共同体。但是，我们又应当如何把这一切告诉别人呢？我们的流离失所，很大一部分是无形的，完全是我们的特殊经历。我们这个共同体，形成的时间太短，经历又太过多样，因此很难用系统的眼光来准确记录我们离散的经历，同时我们也太过健谈，并且经常制造麻烦，无法单纯地做一大群可怜的难民。一位年长的亲戚在过去二十五年来一直对我说，“巴勒斯坦人是一种疾病。”我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尽管因为我们不符合很多分类标准，这毫无疑问地为我们的朋友、敌人，还有我们自己制造了很多困难；肯定地，它还普遍地为描写和表现巴勒斯坦人形成麻烦。

写作这本书的全部目的就是要迎战困难，否认这种对巴勒斯坦人的习惯性简单甚至有害的表现，然后以更能够捕捉巴勒斯坦人复杂现实的描述来代替。它的风格和方法——相互交融的文字和照片，混合的流派、模式和风格——既不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也不构成一篇政治论文。既然我们当前生活的主要特点是剥夺、流散，但又拥有一种与无国状态不相称的力量，我坚信应当使用本质上非传统的、混合的和断续的形式来表现我们。于是，我故意设计了一种与在媒体、社会科学作品和流行小说中常见模式不同的表达形式。这是对于被流散民族的巴勒斯坦人的一种个人化的表现——掩饰、遵从、自豪、软弱、悲惨、滑稽、不屈不挠、讽刺、妄想、防备、过分自信、有魅力、引人注目。

这不是一本“客观的”书。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巴勒斯坦人的眼睛来表现巴勒斯坦人，但同时也不减少巴勒斯坦人感觉就算与自己相比也是不同或者“他人”的程度。很多巴勒斯坦朋友看了吉恩·莫尔的照片后，觉得他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过的我们。但是我们也觉得他所看到的我们就和我们自己会看到的自己一样——在同一时刻，既在我们的世界之内又在之外。同样的双重视角渗透在我的文字中。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不断变换着指代巴勒斯坦人的代词，从“我们”到“你们”，再换到“他们”。虽然这些转换很生硬，但我觉得它们再现了“我们”是如何体验自己，“你们”是如何察

^[1]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动闪电战，仅持续6天就占领了西奈、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等大片土地。这场真正被称为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月战争、六天战争，或“六·五”战争。

觉别人正在观察你们，孤独时又是如何感觉“你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这种多面的视觉对于任何有关我们的表现都是必需的。失去国土，财产剥夺，偏离中心，我们经常无法说明自己所经历的“事实”或者让我们的陈述为人所闻。我们并不通常控制那些被用来表现我们的形象；我们被限制在那些用来控制或阻碍我们的空间里；我们还经常被加诸身上的过多压力和力量所扭曲。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语言，阿拉伯语在西方不为人熟悉，它属于一个常被人误解和诽谤的传统和文明。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所有描写都是翻译自我们的语言、经历以及对自身和他人的感知。

然而，只有认识到这些复杂性，我们才能接近我们特性之难以捉摸的本质，或者结合公众与私人的现实，或者领会那被称作巴勒斯坦人的异常多样的个体和行为。就像吉恩·莫尔和我，一个瑞士人和一个巴勒斯坦人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合作那样，我们希望你们——巴勒斯坦人、欧洲人、美洲人、非洲人、拉美人和亚洲人——也能同样合作。

爱德华·W.萨义德

纽约，1986年

大约两年前当我路过纽约的时候，我去探望一位摄影师朋友，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记者、一位摄影世界中的完美鉴赏家。在热烈地交换了一阵新闻、感想和回忆后，他向我提了个礼节性的问题：

“目前你正在做什么项目？”

“一个展览，展出我三十年来的报道和作品，以及一些色彩上进行美学探索的实验作品。与此同时，我正在完成一本新书，这本书非常接近我的心情。”

“是关于什么的？”

“巴勒斯坦人。”

在相当长的一段沉默之后，我的朋友看着我，带点哀伤的微笑着，最后说道：

“当然了，为什么不！但是你不觉得这个主题已经有点过时了吗？你看，我也拍过巴勒斯坦人的照片，尤其是在那些难民营里的……那的确令人难

过！但现在这个时候，谁还对那些用手从地上取食物吃的人感兴趣？而且还有恐怖主义……我还以为你会把你的精力和才能用到更有价值的项目上呢！”

这个回答正好回应了我要坚持完成这本书的这种愚蠢。但我必须简要解释一下我对巴勒斯坦事业感兴趣的动机。下面这些事实和时间可以作为说明。

1925年，我在日内瓦出生，德国国籍；我的父母亲最初都来自德国南部。

1936年，全家申请移民瑞士，从此“背井离乡”这个词语不再是个抽象的概念。

1949年，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委任我为代表，参加一支为了巴勒斯坦难民而前往中东地区的队伍。那时我刚从日内瓦大学毕业，对那里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我满怀良好的意图，并决心要圆满完成任务。我在贝鲁特的常规地区待了大约三个月以后，前往杰里科^[1]，然后到希伯伦^[2]，我们发放食物，建立难民营和学校，并且实施人口普查。

1950年，红十字援助即将结束；我留下来，担任联合国在伊尔比德^[3]的地区官员。

1967年，我去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两个星期。

1979年，我得到机会，前往以色列和被占领土（约旦河西岸）一个月，随行陪同的是一个精通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朋友：这是一次伤痛心灵的经历！30年过去了，巴勒斯坦人的处境远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难民营里的帐篷被棚屋取代，难民们冬天冷得发抖，夏天热得窒息。新一代出生了，但是有何未来？有何希望？

以色列人并非唯一要被指责的，我们也全都有罪。30年来，我一直尝试着用虚伪的借口来遗忘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我说服自己在巴勒斯坦人中由极端而引起的暴行绝不是正当的，然而我的这种遗忘其实也是有罪的。

在我从那里带回来的照片中，部分已经发表，但这些照片总是发表在发行量很小的期刊上，而我也会欣然地把照片的上下文描述为学术性的。这些杂志的读者群是知识分子，本身就带有向左（或者按照美国人说的自由派）的偏见，换句话说，这些读者早就已经部分地认为巴勒斯坦人主张是合理的。

我之后又数次回到中东：回到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尤其是回去探访

^[1] Jericho, 杰里科，约旦河西岸的小镇。该地区历史悠久，曾是古代巴勒斯坦的都市，如今也是约旦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2] Hebron, 希伯伦，约旦河西岸的城市，位于耶路撒冷西南偏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希伯伦是亚伯拉罕的家乡，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曾是大卫王的都城。据旧约圣经记载，这里也是埋葬亚伯拉罕和萨拉的地方。希伯伦于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

^[3] Irbed, 伊尔比德，约旦的城市。

那些难民营。

在我最近一次以色列之行快要结束的时候，就在我要从特拉维夫^[1]机场出发到瑞士去的时候，一名海关官员——年轻和蔼的以色列当地人——问了我几个让我觉得十分轻率的问题：

“你在我们国家过得怎么样？你住在哪里？……你有没有见到任何阿拉伯人？”

“听着，除非你把眼睛闭上，否则你很难不在以色列看到阿拉伯人。”

“对不起，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拜访任何阿拉伯人？”

她很困惑；我没有坚持。我冲着她微笑了一下，然后往登机口走去。是的，我拜访了一些阿拉伯人和一些以色列人，但是这并不是个合适的时机和地点来向她解释，或者企图说服她。

吉恩·莫尔

日内瓦，1986

^[1] Tel Aviv，特拉维夫，以色列港口城市。Tel Aviv，在希伯来语中，意思是“春天的山丘”。



的黎波里^[1]，巴达维难民营，1983年5月

^[1] Tripoli, 的黎波里, 黎巴嫩北部港口城市, 位于阿里河口, 是北黎巴嫩省的首府。Tripoli 建于公元前700年, 现为黎巴嫩全国第二大城市, 黎巴嫩的商业、工业和旅游中心, 为了区别于同名的利比亚首都Tripoli, 人们习惯地将黎巴嫩的这座城市称为东的黎波里。——译注

目 录

CONTENTS

致 谢	1
前 言 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3
第一章 国家	1
第二章 内部	43
第三章 涌现	79
第四章 过去与未来	119
后 记 贝鲁特的衰落	161

第一章 国家

在单调的阿拉伯城市、难民营和接二连三发生灾难的时空之外，一个贫穷而无名的地方正在举行一场婚礼，令人惊讶、哀伤，还有一点不安。这里靠近黎巴嫩北部的黎波里，这些人的风格和姿态确凿无疑地说明他们是巴勒斯坦人。在拍摄这幅照片的几个后，这个难民营就被巴勒斯坦人的内部战斗所破坏。正在婚礼小径上通过的是在这里经常可见的梅赛德斯汽车，车上装饰着一个特大的标志，那是一个代表德国的骄傲的“D”。虽然梅赛德斯在西方是罕见的奢侈品，但在累范特^[1]这些梅赛德斯——通常是二手或者走私来的——却是最为常见的轿车。梅赛德斯承担起了马匹、骡子和骆驼的职责，甚至更多。梅赛德斯在这里被当作是通用的出租车，标志着被本土化的现代科技、西方对传统生活的入侵以及非法的贸易。更为重要的是，梅赛德斯已经成为全功能的运输工具，被用于各种用途——葬礼、婚礼、婴儿诞生、骄傲地展示、离家、回家、维修、盗窃、转售、逃亡以及躲藏。然而，由于巴勒斯坦人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来庇护他们，梅赛德斯那模糊不清的来源和目的，就像是一个入侵者，代表着那些既扰乱又紧紧包围着巴勒斯坦人的力量。诗人马哈穆德·达威什曾经写道：“大地在我们面前关闭，逼迫我们进入最后的通道。”

迁移和不安之间充满矛盾。不论我们巴勒斯坦人身处何方，都不是在我们的巴勒斯坦，因为巴勒斯坦已经不复存在。从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尽头旅行到另一边，或者去往欧洲、非洲、美洲和澳洲，你在那里找到和你一样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就像你一样，受制于某些法律、某种身份地位，标记着某种并非属于你们的力量和暴力。不论是流散在原来的土地还是流亡到国外，巴勒斯坦人仍然栖息在从前巴勒斯坦的疆域之内（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但他们的处境却悲惨地比过去更加糟糕。他们或者是“朱迪亚^[2]与撒马利亚^[3]的阿拉伯人”，或者是以色列的“非犹太人”。有些被称作是“在场的缺席者”。在除了约旦以外的阿拉伯国家中，政府发放特殊的卡片来鉴别他们是“巴勒斯坦难民”，即使在那里这些人是有名望的工程师、教师、商人或

^[1] Levant, 累范特, 地中海东部地区。Levant 来源于阿拉伯语的 Sham 或 Semite (指住在该地区的居民)。如今, 累范特人主要指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叙利亚人、约旦人和伊拉克人。

^[2] Judea, 朱迪亚, 又写作 Judaea, 是古代巴勒斯坦南部的山区, 包括今以色列南部及约旦西南部。耶稣在世时, 它是由希律王室所统治的王国, 也是罗马帝国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朱迪亚与撒马利亚”一词, 现在大多被“约旦河西岸”所取代。

^[3] Samaria, 撒马利亚, 又写作 Sumaria, Shamron, 在《新约》中指的是约旦河西岸的北部山区, 位于古代巴勒斯坦与约旦河间, 是古代巴勒斯坦的城市, 也曾经是古代以色列王国首都。“朱迪亚与撒马利亚”一词, 现在大多被“约旦河西岸”所取代。

技师，他们知道在他们东道国的眼中，他们将永远是外国。不可避免地，拍摄今天巴勒斯坦人的照片包含和显示了这一事实。

回忆增加了巴勒斯坦人离散的从未减轻过的强度。巴勒斯坦对于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而言都十分重要；东方诸国^[1]和西欧诸国把巴勒斯坦变成了一则传奇。人们不会遗忘它，更不会忽视它。世界新闻经常充斥着在巴以间发生的事件、最近的中东危机，以及刚刚发生的巴勒斯坦爆炸。巴勒斯坦的风景、货物和纪念碑成为商业、战争、朝圣和礼拜的对象，以及文学、艺术、歌曲和幻想的主题。东西方高度的商业文化突然袭击巴勒斯坦。新娘和新郎穿着不合身的欧式结婚礼服，在他们身后和周围却都是属于他们本土的服饰和物品，对他们的朋友和婚礼出席者来说十分自然。这个场合的快乐与他们身为难民无处可去的命运毫无一致。在附近玩耍的孩子与周围毫无吸引力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新郎那巨大的工匠般的双手与新娘精巧模糊的苍白相互冲撞。当我们穿越巴勒斯坦进入其他国家时，即使我们在新的地方过得很体面，那些过去的场景就会在我们身后迫近，如同再生的回忆和现状中的缺失那样，既真实又虚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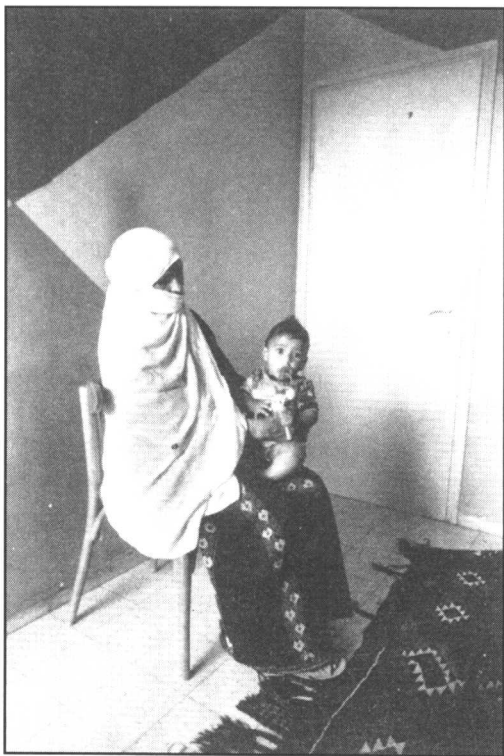
有时面对重新定居就像是在模糊的铅笔痕迹上书写黑体字。身体和新的环境并不适应。角度是错误的。本来应该被用来装饰墙面的线条却构成了一个有缺陷的装配盒，把我们放在其中。我们就座于椅子上，不确定是否应该和对面的人讲话。孩子被提起，但又被压抑着。男人和女人们重复表达着他们周围不讨人喜欢的事物：女人的长袍在脸上形成的角度让墙壁的图案双倍惨白，男人交叉的双脚重复并且抵触着向外延伸的椅子腿。他显得不安定，准备要离开。现在怎么样？现在去哪里？突然，我们的形象正表现出我们的短暂和无常，人们把我们看作是可以强迫放到另一座房子、另一个村庄和区域的对象。就像我们曾经被人从原先生长的环境带到新的地方一样，我们可以被再次搬迁。

离散是一系列没有姓名和上下文的肖像。画面大多不加解释，没有姓名而且无声沉默。当我注视着它们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精确的信息和知识，但是它们现实主义的精确却比单纯的信息留给我更加深刻的印象。我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这些被拍摄的人们，只能通过一个欧洲摄影师为我来观察他们。我想象他，通过翻译依次和他们交谈。然而，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肯定，他们对他十分礼貌，或者表现出那样的倾向，好像他是导致他们如此悲惨的那些人之一似的。人们感到很窘迫，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被观察和记录。然而，他们却无力去制止这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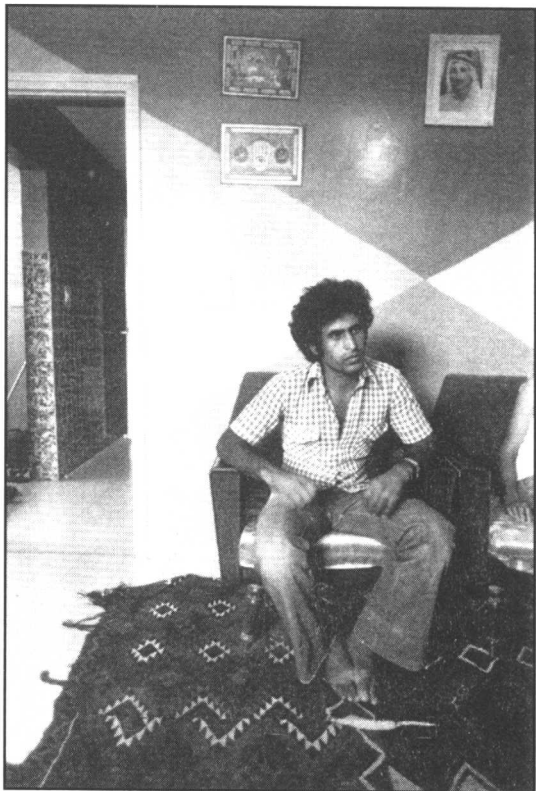
※ ※ ※ ※ ※ ※

当A.Z.的父亲快要去世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子女叫进房间，进行最后一次家庭聚会，他的其中一个儿子娶了我的姐姐。他是一个年纪很大的虚

^[1] Orient, 东方诸国，指的是地中海东部的国家。



泰勒什瓦，1979年。位于贝尔谢巴^[1]附近，是一个定居下来阿拉伯游牧民族所构成的村庄。几年以前，这些人仍然生活在帐篷里，头顶沙漠的天空。如今，唯有脚下的地毯还能让人们回忆起那段岁月。



^[1] Bersheeba, 又写作Beersheba, 贝尔谢巴, 以色列南部城市, 是以色列的第5大和内盖夫沙漠上的最大城市。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创世纪》, 被认为是亚伯拉罕和 Abimelech 之间许愿的地方, 因此也被称作是“许愿之井”。Bersheeba 的居民主要来自阿拉伯国家和前苏联的犹太人移民为主。Bersheeba 周围大多为犹太人的卫星镇, 以及 7 座阿拉伯贝多因游牧民族的小镇, Tel Sheva 是其中之一。